

碟碟不休

北京电影节观影记

■韩连庆

【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悟出来了，这世界上没有非看不可的书也没有非看不可的电影。】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

这是今年4月份举办的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口号。参赛得奖是别人的事,对影迷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电影节期间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心仪的电影。此前的北京电影节屡遭影迷们的诟病,认为不如上海电影节展映的影片质量高。今年的北京电影节有较多改善,新片老片扎堆,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部电影在30余家电影院进行上千场的放映,据称是历年最好的一届。这听着既让人兴奋和激动,也让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参观完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后说的那句话: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我不想看的书!

电影节一开票,很多重要的场次,例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套票、美国导演大卫·林肯

的套票和《乱世佳人》4K修复版,几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票房也创历年新高。看电影是件快乐的事,如果搞得跟完成任务似的就走了样。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悟出来了,这世界上没有非看不可的书也没有非看不可的电影。我不想凑那个热闹有那样的负担,干脆随心所欲,采取“捡漏”方式观影。除了非做不可的工作,把手头的事情全部停掉,早晨起来先在网上查找一番,看看哪些场次还有余票,临时决定看哪一场。看完一场如果感觉还行,接着看下一场。

电影节期间看电影是个体活,每天不是在看电影就是在看电影的路上,背着干粮在不同的影院之间奔波,连轴转地看电影。为了把更好的精力放在欣赏电影上,我决定“死守”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减少在路上的奔波时间。其他影院基本上只在晚上和周末才放映展映的电影,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全天候放映,非工作日的白天都有余票,现场即可买到。

选择看的电影以经典修复和电影大师的作

品为主。经典老片质量有保障,不像新片那样搞不清好不好看,更重要的是难得在大银幕上看到。看电影大师的作品是为了能够由此登堂入室,以后努力把他们的作品全看一遍。如果同一部电影有多个场次,尽量选择映前映后有主题活动的场次,以增加感性认识。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看的电影,不必一味懊恼和后悔,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弥补缺憾。

美国导演科波拉的《教父》经过4K技术修复后曾多次在各种电影节上展映,可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传说,没机会看到。今年的北京电影节再一次展映了《教父》,足见这部电影的魅力。当拿到电影票的一瞬间,当坐在电影院里听着熟悉的音乐想起时,不由得异常感慨和激动。我从录像带时期就开始看《教父》,后来又收了VCD、DVD和蓝光版,这次又在电影院里看了一遍,算是“全活”了。修复版的质量非常好,色彩偏暗黄色,画面颗粒感很强,有油画的感觉,只是画面稍小,略有缺憾。《教父》

不属于那种让你一见倾心的电影,但绝对值得反复观看,每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触。这次让我最感慨的是表面沉静的小儿子如何不动声色接了老子的班,一步步清除异己做掉对手。大概因为以前多次展映过,这次《教父》的放映安排在了工作日的上午,所以偌大的电影院里观众并不多。除非是铁杆影迷,谁会大早晨爬起来就跑到电影院看电影呢?

2017年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逝世十周年,电影节的“致敬大师”单元安排了对他的回顾展,集中展映了他的13部长片。按照展映手册上的介绍,安东尼奥尼一向关注现代社会中个人存在的永恒命题,透视繁华表象之下现代精神世界的颓然败落与倒塌。可他的电影属于典型的“闷片”,DVD时代我收得多看得少,从头到尾看完的只有一部《放大》。这次在电影节上看了《扎布里斯基角》,这是安东尼奥尼为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拍摄的,反映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嬉皮文化。电影中的马克不满足威学生的夸夸其谈,决定真刀真枪地实干。他偷了一架飞机,在飞跃沙漠公路时邂逅了开车去开会的地产公司的女秘书达莉亚,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无限春光在险峰”的故事。电影既有批判现实的成分,也充满了臆想,属于概念先行的电影,要是在家里看我肯定看不下去。看来大师也有失手的时候。 (未完待续)

打印一首3D的诗

■千黛

我也是一台3D打印机
一颗无尽的诗心里
储存着无尽的打印原材
常常自己也不知那是什么
是谁何时启动那打印键
一概不知

一见钟情
我打印出满面桃花
四目相对
我打印出滚滚秋波

边听梅兰芳边起手
不由自主地打印出
蝴蝶也会飞来的兰花指
边看《寒食帖》边患腕
情不自禁地打印出
一笔“万岁藤蓀”
苏轼居然在《寒食帖》里
向我微笑

晨曦里的林间小径上
我打印仙鹤的一段展翅飞行
我在地上比它在天上
一样地优雅映水
晚霞中的青玉案上
我打印汉字的八句诗行
凝练出一个字一个字的分量

一颦一笑动静皆怡
一书一卷温言良语
举手投足顾盼流转
处世立身思德明贤

原来我也是一台3D打印机
随时都在工作
或快或慢地
永远在打印这一首诗
或远或近地
等待着打印下一首诗

题记:今日看到电视新闻中
讲德国的一台3D打印机打印糖
果,有感记此。

爱乐者说

音乐『愤青』的『行为艺术』

■李近朱

【而今看来,大约从贝多芬开始,在音乐发展的漫长路程中,不乏与时代息息相关的音乐“愤青”。他们的“行为艺术”,既是音乐的也是政治的。】

无论哪个时代,总有些俗说的“愤青”留下不少难忘的事。艺术史上也有他们的履迹。

说到音乐,那种灵感突至的方式,方便音乐家激情四溢。贝多芬曾猛然冷水浇头,让音符随一头发水泛滥到楼下邻居居室。这虽是个人的冲动“行为”,却常挟带灵感,让杰作不是写出而是涌出。重要的是,走出个人,在时代大背景下,敏感的音乐家也常极富正义感,现出“愤青”般的激烈言行。在他们身上,这也是“灵感”,堪为一种“行为艺术”。

罗曼·罗兰曾写道:“大革命爆发了,弥漫全欧。这,立刻占据了贝多芬的心。”当巴士底狱陷落,诗人希那哀特写出“专制的铁链断了”的诗句。青年贝多芬率先预定了这部诗集。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将《第三交响曲》,献给时代骄子拿破仑。当其称帝,贝多芬则愤斥这个“凡夫俗子”,涂去题献,再标名广义“英雄”,以寄其“共和理想”。同一时代,音乐家舒伯特用文字写下题为《可悲啊!人民》的诗,指斥专制使“无限的痛苦在折磨着我”。在维也纳,被称为“舒伯特小组”的团体,在警察监视的档案中留有“不良”记录。

作为音乐家,贝多芬和舒伯特只在思想和言论上发出愤懑之慨,并构成音乐风格上的“英雄性”和“忧郁感”。只有到了大革命爆发的年代,音乐“愤青”才有了更激进的“行为艺术”。

欧洲进入法国大革命时代之时,法国音乐家柏辽兹正经四次考试三次失败,刚获“罗马奖”,准备深造。但他却拿起枪,上街高唱《马赛曲》,投身到枪林弹雨的巷战之中。1830年,这名音乐战士将《马赛曲》改编为气势宏大的管弦乐曲,并在扉页写下:“献给一切有声音、有心灵和有热血的人。”

比柏辽兹小十岁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在15岁那

年,贝多芬音乐的英雄气质,悍然击中了这位同乡的年轻心灵。他说:“我的心激动得快要破碎了。”当时,欧洲革命风潮激荡。音乐少年的敏感心灵,心向革命。在1848年德国大革命那一年,瓦格纳发表了直接题为《革命》的文章;在1849年德累斯頓的五月起义中,他成为街垒中一名战士。为此,他遭到通缉。在李斯特等正义音乐家的帮助下,瓦格纳避到瑞士等地,开始长达近十二年的流亡生涯,直到1861年解除通缉,才回到祖国。流亡中,他创作了歌剧《罗恩格林》等音乐作品以及撰写了《艺术与革命》等文章。在他的音符中,在他的文字里,始终布道“革命”。即使离开街垒,只在艺术领域,他的理想也是革命:对传统歌剧瓦格纳进行革命性的变革,终以音乐戏剧的宏大格局,创作了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成为一代歌剧艺术宗师。

而今看来,大约从贝多芬开始,在音乐发展的漫长路程中,不乏与时代息息相关的音乐“愤青”。他们的“行为艺术”,既是音乐的也是政治的。比如,苏联的别加耶“世而立的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其留于后世的肖像总是皱着眉头。他曾两度遭到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在压抑中度过了一生。有幸未被清洗的这位音乐家,在其死后留下的回忆录(见证)中,尽述了他在现实中没有爆发的苦闷。但那时,在音乐里,他也有“愤青”一般的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围困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里,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标题为“列宁格勒”的《第七交响曲》。多少年来,作品皆解释为一部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之作;近年来,多方考证,也有观点认为,此曲融进了作曲家对于斯大林“大清洗”年代的“愤青”表达。

音乐和任何艺术形式不同,是与人类的情感有着最直接最感性相通的一种艺术样式。在时间的流动中,人的情绪情感能够直接表达出来;就像当时当刻在场的嬉笑怒骂,表达时不需任何联想和想象,不需任何间接介质的再传达。这个“直接”的特征,让音乐直通直达直击直叩人的内心。因此,在音乐之外,任何社会的时代的以及个人的际遇,皆可触动音乐家的感情或灵感,于是,不仅成就了烙印鲜明的作品,也导致了他们投身于音乐之外的社会活动和革命行动,以至于可以拥有流亡十余年的“光荣历史”,这不啻为音乐“愤青”的一种“行为艺术”。

究其渊源,往往性格造就命运,命运造就艺术。音乐的感性特质作为诸多音乐家性格的构成因素,使他们以正义之感,步入“愤青”行列。可以说,多多少少,音乐这个敏感的艺术淬炼了音乐家的性情,激发起他们的“愤青”行为;大大小小,音乐家的敏感性情又以“愤青”式的“艺术行为”,写下不凡生涯,同时催发他们给后世留下激情四射的不朽之作。

自由和创造力,充盈0与1之间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正是我们得以考察电子书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生产和认知演进的地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

《中国科学报》:能否从作者、读者及文本关系的角度谈谈电子书?

戴联斌:一个文本表达的观点,作者希望读者认同;文化制度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接受和服从社会和文化规则。这是传统书籍对阅读行为的局限。

实际上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屈从于这个模式,阅读终究是一个主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行为。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无疑能帮助读者部分突破这些局限,读者从一开始就能参与文本写作和传播,甚至电子书的制作。同时,电子书的流通和使用也改变了读者群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这些体验是纸质书不能带来的,但对这些体验的想往历史上一直存在。

《中国科学报》:那么,电子书带来的变化会是质的变化吗?

戴联斌:理论上,一个文本的电子版具有和纸版不一样的物质形态,读者读取的意义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尽管需要坚实的实证研究,但就阅读体验来讲,电子书中的互动功能比纸质书籍丰富而强大,因为由0和1构成的“智能”,能帮助读者使用和理解电子文本,这是纸张和油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就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而言,电子书确实带来了质的变化。

但是,阅读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规则和秩序对这个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认定人类借助电子书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和秩序,足以重塑人类社会、文化生产和认知演进,那电子书就是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只是迄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苗头。

因此,对于数字技术带给阅读行为的变化,没有必要过于褒扬,也没有必要特意贬低。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冷静观察它给某些人和某些领域带来的变化。



■张田勘

到巴马去,到巴马去
巴马的山水能治病?

【日本冲绳人也长寿健康,但是他们的饮食与巴马人大不一样,巴马人是靠山吃山,冲绳人是靠海吃海。】

隐藏在广西喀斯特地貌山区的巴马曾是一个宁静的小县,但近年成为一个喧嚣拥挤的“福地”。中国各地的病人和老人被这个长寿之乡的宣传所吸引,纷纷来此寻求灵丹妙药,瓶装的“巴马活泉”、拜访百岁老人,以及寻找更健康更长寿的建议。

尽管一些人感到自己恢复了活力,治好了疾病,获得了新生,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感到失望和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并未治好自已的病,也不可能像巴马人那样长寿。并且,无数外地人涌入巴马(只有27万人,面积为1971平方公里的巴马每年要接待200多万游客),也让巴马当地人相当郁闷和厌烦,认为外地人让过去去安静、原始的巴马变成了到处是垃圾和病人的地方。

不过,外地人也有苦水,除了到巴马未必能祛病、健康和延年益寿外,还可能遭遇宰客和骗局。例如,广告承诺能让饮用者摆脱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疾病的“巴马活泉”约为4100元人民币一吨,街头小贩兜售的医用喷雾据称含有蛇和蝎子的分泌物,能治疗脚气、痛经和关节炎,但效果未必如此。

显然,对多数人来说,对巴马抱有的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因此,对巴马向往之前和之后,去巴马之前和之后,都需要细细思量几个问题。

巴马那个地方能祛病、健身和长寿早就被总结出了几个要素,遗传、社会和自然环境、医疗保健水平和生活方式,因此,需要思量的便是,如果到了巴马,这几方面的

要素对你能起到什么作用?

研究人员曾对巴马现有的82位百岁老人调查发现,68%的百岁老人属于长寿家族。也就是说,他们有长寿基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因,也就失去了一个条件。

当然,长寿基因的形成是自然选择和生活方式养成的结果,也有研究总结了巴马人享有的几种有益健康和长寿的自然要素是水、阳光、空气、磁场,这些似乎都比其他地方好,这也是一些人为何来到巴马后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即便巴马的月亮比其他地方圆,那也是巴马人得天独厚的,因为这些自然条件是巴马人与生俱来,终生享有。外地人到巴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享有这一切,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与巴马人长期居住当地而获得的自然环境荫庇,当然不现实。

再从饮食角度考虑,巴马人的饮食似乎也没有秘诀,就是粗茶淡饭。常见的主食不过是玉米、大米、小米、红薯、黄豆等;常吃的蔬菜是南瓜苗、红薯叶、青菜、苦麻菜、雷公根、野藤菜、野蘑菇、香菇、木耳、竹笋;常吃的肉类是当地盛产的巴马香猪、甲鱼、黑山羊;最爱吃的菜是“合渣菜”,即将黄豆磨成粉或浆状,配以各种蔬菜一锅煮。

这样的饮食外地人是否吃得惯,即便吃得惯,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还得看长期效果。巴马人从小就适应了这样的饮食,并且形成了通过这种饮食代谢而支撑其生理功能的结构、程序和方式,外地人未必在这些方面都能像巴马人一样。

此外,还有一些条件更有可能是外地人到了巴马也难以做到的。例如,巴马人的

晚婚晚育和节俭,还有巴马人终身的劳作,成年人在山脊中的梯田里爬上爬下耕作和劳动,孩子们从小就爬山路上去上学。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讲其实更像是一种苦行僧似的原始生活,但是巴马人甘之如饴或以此为常。

即便外地人到了巴马,也未必能像巴马人一样满足上述方方面面的条件,因此不具有巴马人那样的延年益寿和祛病强身的效果也是一种必然。但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去巴马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实施并产生效应的。

日本冲绳人也长寿健康,但是他们的饮食与巴马人大不一样,巴马人是靠山吃山,冲绳人是靠海吃海,后者除了有丰富的海鲜可吃外,还吃猪肉、豆腐、苦瓜、荞麦面、海带、海白菜、海葡萄等。

显然,巴马人的饮食与冲绳人大相径庭,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粗茶淡饭,而且,这两地的人都有其他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较慢,心理压力较小,并且终身劳作和运动。这些共性的东西无论在什么地方生活都是可以做到。

正因为如此,在污染很严重的北京,现在也有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279.3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1.2%,比巴马的60岁以上老人比例还多,巴马县户籍60岁以上老人33372人,占总人口比例达11.56%。只是在百岁老人数量上,北京远不如巴马,前者百岁老人589人,占总人口的0.004%;后者百岁老人82人,占总人口的0.03%。

不去巴马,而且即便没有长寿基因,但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同样可以祛病延寿。